

四众共筑：明清黄山佛教 区域系统的构建*

王开队 柳 雪

明清时期是黄山发展成为江南区域性佛教名山的重要时期，其中以明代万历普门开山以后至清初顺治、康熙时期最为重要，在此期间黄山迎来了建寺、修寺的高潮。经过数百年营造，在黄山地区形成了以“四大丛林”为中心、以四条山路为轴线的区域性寺院空间分布格局，就道场营造而言，黄山作为佛教名山的区域系统大致形成，一跃成为江南著名的区域性佛教名山并因此成为明清皖南佛教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商、学、教这四种力量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黄山 佛教名山 区域佛教系统 历史宗教地理学

作者 王开队，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柳雪，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出于修行及传播的需要，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其对于道场的重视便不言自明。而在众多道场的营造过程中，就选址而言，各地名山似又得到格外的垂青。自宋代江南“五山十刹”到明清“四大名山”，大体形成了中国佛教名山的基本格局。^① 名山信仰的形成，是一个“经典、地理、感应传说、塔寺、信徒、国家支持”的综合历史过程，是中国佛教信仰圈的最明显标志。^② 由此，名山佛教也构成了历史时期中国佛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事实上，不惟“四大名山”，明清时期也是各地佛教神圣空间营造的重要时期，各地大多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各自区域的佛教名山。徽州自南宋以后号称“东南邹鲁”，理学一直牢牢占据着徽州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与徽商、徽州宗族一起成为徽州社会的三驾马车，即便是在这一形势下，明清时期黄山佛教亦异军突起，^④ 一跃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性佛教名山，并因此成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徽州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研究”（20BZS122）、2020年度安徽* 大学文科重大科研培育项目“徽州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及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历史地理学视阈下的明清皖南佛教研究”（SK2019A0401）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安徽大学文科创新团队“数字人文与徽学研究”资助。

① 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页。

② 圣凯《明清佛教“四大名山”信仰的形成》，《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

③ 严耀中先生认为，依据中国古代佛教寺院所处的环境，中国古代的佛教寺院主要可分乡村、名山、城市三个类型，这也构成了寺院存在的环境差异，从而影响了寺院佛教的发展，并构成寺院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型（参见严耀中《试说乡村社会与中国佛教寺院和僧人的互相影响》，《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

④ 本文所指之黄山为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黄山山区，而非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黄山市，特此注明。

为明清皖南佛教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而考诸史籍,我们不难发现在明清黄山佛教区域系统的构建过程中,政、商、学、教这四种力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明清黄山佛教的发展概况

据《黄山图经》载“黄山旧名黟山……即轩辕黄帝、浮丘公、容成子栖真之地……黄帝与容成子、浮丘公同游此山,浮丘公于炼丹峰峰顶炼丹”。^②唐天宝后好道家之说,因传黄帝曾经游览炼丹,便以黄山命名,此后黄山被贴上了道家仙山的标签,成为道家修身养性、寻道访仙之圣地。道教传入黄山的确切年代不详,唐朝之前黄山可能就有道教存在的痕迹。浮丘观是方志记载中黄山最早兴建的道观,据《黄山志定本》记载“浮丘观,在浮丘峰下,唐会昌中拆毁,观址犹存,水旱祈祷立应”。^③宋代黄山道教盛极一时,先后建有升真观、城山观、松谷庵等。其中,九龙观“唐开元中为僧舍,宋政和五年敕改九龙观”。^④南宋末年,张松谷来到黄山,开辟道场、传法布道、济世救人,并且结交徽州望族馆田李氏,张松谷成为黄山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位道人。

至于佛教何时传入黄山,具体时间亦无从考证。相传“南朝宋元嘉年间,东国沙门结茅于此”,^⑤这是关于黄山佛教的最早记载,但是没有相关详实佐证材料。至唐宋时,黄山佛寺逐渐增多。唐开元十八年,志满和尚在汤泉结茅。志满,洛阳人,幼年投颖川龙兴寺出家,后南游黄山灵汤泉所结茅,此时黄山多有虎患,志满和尚言虎豹亦有佛性,于是驻锡焚香,虎患亦平息,^⑥后在白龙潭上桃花涧建汤院,至宋时改名为祥符寺,是当时黄山最大的佛寺,也是黄山可考最早建立的佛寺。此后,唐中和二年,麻衣祖师又于翠微峰下建翠微寺。宋代黄山佛教的发展以黄山北路为主,这里靠近太平,又有当地望族焦村焦氏的支持,佛教发展较快,先后新建普佑院、新兴寺、重兴寺等,其中受朝廷赐额的有翠微寺、新兴寺、兰若寺、乡林寺、重兴寺、药林寺、普佑院7所,可见宋代黄山佛教已经受到了统治者的一定肯定。

至明代黄山佛教迎来快速发展时期。以时间节点而言,明代黄山佛教发展大略可以普门入山为分界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普门入山之前,佛教发展缓慢,修建寺院较少;普门入山之后,开山修路,进京请愿,得到万历皇帝和皇太后嘉赏,黄山佛教发展迅速,新建、重修了大量寺院,也吸引了大量名僧前来驻锡。

明代早期,由于交通不便,外界至黄山道路艰险,加上当时还有虎患,需成群结队入山,山中险要的地方也无法通过,这一时期黄山新建的寺院只有御泉庵与水晶庵,皆规模较小。明宣德年间李德庄重建松谷庵,改为寺庙,名松谷寺,松谷寺由道观变为寺院可谓黄山佛教发展史上的

① 皖南区域佛教史专题论述不多,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黄夏年主编《水西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张轼《佛教与安徽》(安徽新闻出版局1997年版)、李霞《安徽区域佛教的发展与传播》(《池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李霞《九华山佛教传播中心与文化特质形成及现代意义》(《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2期)、李霞《论皖江佛教传播中心与文化特质的变迁》(《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卢忠帅《明清九华山佛教文化研究》(南开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王开队《历史宗教地理学视阈下九华山佛教文化体系的建构——以寺院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3期)、王开队等《明代青弋江流域佛教系统初探——以寺院时空分布为中心》(《安徽史学》2017年第3期)等。

② (宋)佚名《黄山图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281页。

③④ (清)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卷二“建置”,民国二十四年安徽丛书编印本。

⑤ 《黄山志》编纂委员会《黄山志》,黄山书社1988年版,第223页。

⑥ (清)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卷二“人物”。

标志性事件，说明佛教可能开始在黄山的宗教发展史上逐渐占据上风。嘉靖以后，徽州当地及周边士人把目光投向黄山，或入山读书、或入山游玩、或入山修道，在黄山的自然风光与佛教影响中追寻心灵的超脱。嘉靖年间，文坛领袖王世贞曾带领三吴两浙一百多名文士组成社团，由徽州本地文人汪道昆负责接待，入黄山游览，盛况空前，大大提高了黄山的知名度，扩大了黄山的影响，也间接刺激了黄山的佛教发展。这一时期祥符寺、翠微寺等得到了修缮。

至万历三十四年，普门和尚感梦至黄山，从此驻锡黄山。万历三十八年，在徽州士绅的帮助下，普门和尚进京请求敕封，得到万历皇帝及李太后等的嘉赏，朱砂庵得到万历皇帝御书“护国慈光寺”匾额，成为江南名刹。当时慈光寺有山门、前后大殿、三进庭院，左右设藏经楼，金碧辉煌。普门主持黄山慈光寺期间，先后修建了慈光寺、文殊院、大悲院三所黄山著名佛寺。此外，他不顾山高路险，攀上了天都峰绝顶，又打通了号称“天上玉屏”的玉屏峰之路，深入到了黄山内部，并且修通了黄山的山路，普门和尚因此被尊称为“开山僧人”。普门来黄山后，高僧云集，阔庵自关中而来，力佐普门开山，负糗粮，登险绝处，了无难色；方来，沁水人，佐普门开黄山，建立十方。

明朝后期，得徽商支持，黄山亦新建不少寺庵。据《黄山志定本》记载，崇祯年间，鲍正元在祥符寺旧址上新建了莲花庵，余书升更是新建了桃源庵、颍林庵、青莲宇三所寺庵，方一藻新建贝叶庵。

明清鼎革之际，黄山成为遗民的重要避难所，浙江、汪沐日、凌世韶等人纷纷剃发为僧，驻锡黄山，这无疑促进了黄山佛教的发展，使得清朝初年黄山高僧驻锡、信徒云集、香火鼎盛。“当今康熙丁巳十六年间，……本邑诸绅士公启特请嘉禾雨峰和尚，主持法席于康熙戊辰……庚午腊月施衣钵传戒焉。”^① 释超纲来到翠微寺，在他主持期间，修撰了《翠微寺志》，这也是黄山历史上第一部寺庙志；浙江兼工诗书，爱写梅、竹，但一生主要以山水名重于时，是新安画派的领袖，并且是清初画坛“四大高僧”之一；雪庄居于黄山三十余年，遍历黄山前后海，著有《进黄山》《喜慈光方丈过访》《云舫杂景诗》等诗文。

就道场建设而言，在徽州士绅及僧侣的努力下，乾隆之前黄山佛教进入一个较长的恢复期，而在此之后则逐渐走向衰落。康熙二年，谢君兆重修了玉壶庵；康熙四年，墨浪庵得到重修；康熙五年，黄僮等捐款重修慈光寺大殿，“四年后落成，耗银四万余两，慈光寺殿宇雄丽，有藏经阁一百余间，为新安梵宇之冠”^②；康熙十年，雨老和尚修葺大慈庵；康熙四十年，在中洲和尚的住持下，慈光寺又维修寺宇，大殿高悬康熙手书“黄海仙都”匾额；康熙间，神立僧还重建了黄山西路最重要的寺庵钓桥庵；乾隆二年，慈光寺遭遇火灾，藏经阁焚毁，大殿倒塌，次年，僧悟千略作小修，但慈光寺百年兴盛不复存在，僧人流散，寺宇倾颓，这也标志着黄山佛教开始走向衰落；又，乾隆二年，“黄山蛟水发，石裂山颓，祥符古寺顷化乌有，山氓之漂没者数百人，翌日水平，尸横满野”。^③《歙事闲谭》载“送谭影序中，言黄山佛寺，旧有七十余，而祥符最著且古。自康熙间水绝，余亦大半淹废，今存者惟慈光与云谷”^④；至咸丰年间，由于受天平天国兵乱影响，翠微寺、福固寺、松古寺、大悲院、师子林、继竺庵、横坑庵等寺院都毁于兵火。至清末，黄山仅存21所寺院。

历史时期黄山佛教的发展无疑是有阶段性的，这一点在佛教寺院和高僧的表现上尤为明显，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对相关方志中的黄山新建寺院和高僧住锡情况进行了统计：

①（清）释超纲辑《翠微寺志》，《中国佛寺志丛刊》第13卷，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23-24页。

②（清）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卷二“建置”。

③《黄山志》编纂委员会《黄山志》，第218页。

④许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版，第955页。

表1 黄山历代建立寺院一览表

朝代	新建寺院
唐朝	翠微寺、祥符寺
宋朝	普佑院、新兴寺、重兴寺、广福寺、兰若寺、乡林寺、药林寺、兴国寺
元朝	巢翠庵、大悲庵、吕公庵
明朝	御泉庵、水晶庵、香山庵、慈光寺、大觉禅寺、文殊院、大悲顶、大悲院、不立名字庵、掷钵禅院、桃源庵、颖林庵、青莲宇、引针庵、净林居、天海庵、普贤院、慈明庵、双举庵、指象庵、兜率庵、莲顶庵、翠云庵、别峰庵、贝叶庵、水月庵、西明庵、莲花庵、九峰庵、平天院、宝珠庵、石鼓庵、镜台庵、墨浪庵、海潮庵、指月庵、龙蟠坡庵、卧云庵、赵州庵、散花庵、黄谷庵、定空室、石筍缸、云涛庵
清朝	弘济庵、西峰堂、翠云庵、□庵、种德庵、莲华庵、甘露庵、白龙庵、书礼庵、竹林庵、集庆庵、紫云庵（茅蓬庵）、狮子精舍、末山庵、半禅庵

资料来源：何建明主编《中国地方志佛教文献汇纂·寺观卷》第176、17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清）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民国二十四年安徽丛书编印本；（清）释弘眉撰《黄山志》，清康熙六年刻本，慈光寺藏本。

表2 黄山历代驻锡僧人一览表

朝代	驻锡僧人
南朝宋	东国僧
唐朝	志满禅师、麻衣禅师、目轮禅师、岛云
宋朝	行明、清素禅师
元朝	妙真、普惠、宗茂
明朝	大时（号白毫）、慈明师、智空、一心和尚、海运、朝宗和尚、一斋、如孝、毒鼓、大守、广奇、墨浪、宝相、雪峤大师、尼用持、融真、印生、如愚、水斋、云外大师、槩庵大师、无得、心月、普门大师、文斋、无易、雪奇、心空律师、林皋大师、玉庵、寓安大师、云谷禅师、一乘、方来、阔庵、无相师、老巢、万缘、印我、晦云、石雨大师、智舷、静庵、照微、佛浩、号一、大用、果然、海希师、亦幻师、智传禅师、全宁、崇梵、涵虚、蒲团、旸谷、成滨、启扉、本是
清朝	雨峰禅师、弘仁浙江、吴山大师、无知大师、尼丽明、道據、时若法师、见月律师、楚烟族、神立师、元白和尚、行伟、僧泽、柏子（弘道）、金山铁舟禅师、如东、能悟、一相、瑀生、今子禅师、无凡、肩吾禅师、恒如、印闻、月得和尚、锦云、德圆、能学、云外禅师、半庵头陀（法名行印）、断山老人、檀越、中洲和尚、雪庄、释弘眉

资料来源：（清）彭泽修《弘治徽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清）江登云纂《橙阳散志》，嘉庆十四年刻本；（清）释弘眉撰《黄山志》，清康熙六年刻本，慈光寺藏本；（清）释超纲辑《翠微寺志》，广陵书社印行本；（清）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民国二十四年安徽丛书编印本；安徽省通志馆纂《安徽通志稿·佛门龙相传》，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清）石国柱、楼文钊修，许承尧纂《歙县志》，民国二十六年刻本；（清）马步蟾修《道光徽州府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黄山志编纂委员会《黄山志》。

从上述统计来看，明代黄山共新建44所寺院，共有59位驻锡僧人，其中寺院建立时期可考的有28所，僧人驻锡时期可考的有44人。万历之前黄山新建寺院2所，驻锡僧人6人，万历至崇祯黄山新建寺院26所，驻锡僧人38人。就新建寺院和住锡高僧数量而言，明万历至清康熙这一时期的数据均居绝大多数。^① 这一数据大致可以反映不同历史时期黄山佛教发展的概貌。当

① 详细数据考证见柳雪《明清时期黄山佛教地理研究》（安徽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二章、第三章相关内容。

然，为了更能直观反映明清时期黄山发展的具体时段性特征我们还可以采取“关注度”表达的方式予以说明。根据统计，明代黄山共新建44所寺院、修缮寺院13次。如果把新建和重修、改建同样视为是政府和社会对黄山佛教发展的关注，从而对黄山的寺院新建、修缮做一个统计，每新建、修缮一次算一次关注度，可以得出黄山一共在明朝获得57次关注度，其中有16次寺院新建时间不详，1次寺院修葺时间不详，那么时间可考的关注度为40次，其中洪武朝1次、宣德朝1次、正统朝1次、天顺朝1次、嘉靖朝3次、万历朝23次、崇祯朝10次，可以看出万历和崇祯时期明显要多于其他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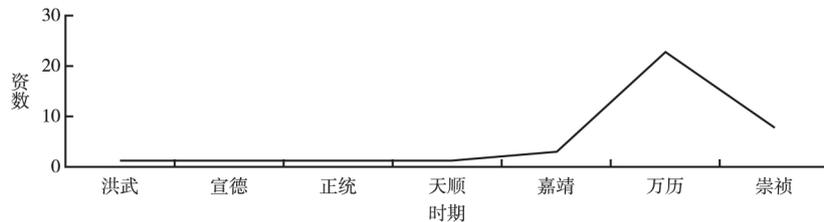


图1 明代黄山佛教寺院各时期关注度曲线图

同理，清代新建寺院和修葺寺院共31次，可考朝代的关注度为29次，其中顺治朝6次、康熙朝12次、乾隆朝2次、同治朝1次、光绪朝8次，顺治、康熙二朝居多。清朝前期，社会稳定，统治者支持佛教，所以获得了较多关注。清后期战乱频发，关注下降，光绪时期，对损毁寺院进行部分修缮，黄山佛教又获得了一定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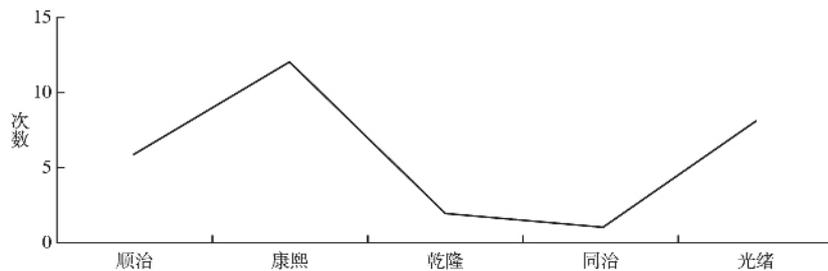


图2 清代黄山佛教寺院各时期关注度曲线图

二、明清黄山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布

就历史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任务而言，复原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场所是其主要任务之一。具体到佛教历史地理研究来说，佛、法、僧三宝聚集之所是为寺院，因此，复原不同历史时期佛教场所是研究佛教历史地理的核心任务之一。当然，这一工作极为不容易，这不仅因史料缺载或古代定位不精等原因，也有不同类型史料记载的空间差异问题所致。而由于这一工作的极端重要，在无法完成与现代测量技术精确定位对比的情况下，对于某一历史阶段特定空间佛教场所空间分布大致复原的工作也就显得极为必要了。就历史时期的黄山而言，由于其在明代以前人们对其认知极为有限，加之山地特有的地形地貌原因，明清时期形成的寺院群体集中分布于当时人们所熟悉的狭窄山区。因此，我们对其寺院空间分布的复原不能严格按照政区结构模式来进行复原，而只能因地制宜，就其小尺度空间范围内寺院的大致空间分布来进行解析。

具体来说，作为山岳地区，由于地形复杂崎岖，明代之前，黄山地区佛寺多建在黄山外

围的村镇或者山脚下；万历以后，普门开山，大致修建了四条山路，从此，寺院才深入到了黄山内部地区。至明清之际，黄山地区的佛教寺院大致形成了以“四大丛林”为中心、以四条山路为轴线的总体空间结构格局，就道场营造而言，黄山作为佛教名山的区域系统大致形成。^①

黄山佛教“四大丛林”即祥符寺、慈光寺、翠微寺和掷钵禅院（即云谷寺），其中：翠微寺在翠微峰麓，“唐中和二年麻衣祖师包西来振锡翠微峰下，置麻衣道场，经数百年迭有兴废”。^②嘉靖间，得佛浩师等重修梵刹并整祖塔。万历戊戌，翠微寺被洪水冲毁，寺僧修缮。万历己酉，心空大师重建翠微寺，规模大于原寺。翠微寺高耸云端，环境雅秀，在黄山地位甚高。潘之恒曾云“黄海诸峰与翠微不可以大小尊卑论矣”。^③康熙二十七年，僧释超纲编辑《翠微寺志》二卷，记录了缘起、山图、释、赋、碑记、艺文等内容；祥符寺在紫石峰下，前身为汤院。“唐开元天宝间志满禅师创始，大中五年，刺史李敬方感白龙现，建龙堂于汤池之西。天佑二年，刺史陶雅建寺号汤院，南唐保大二年敕为灵泉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敕改今名”。^④明正统、嘉靖、万历年间都进行了修缮。祥符寺四周群峰耸秀，古木青翠，“寺壁旧有罗洪先所题之诗二首。其一：‘紫翠林中便赤脚，白龙潭上看青山。药炉丹井知何处？三十六峰烟月寒。’其二：‘何年白日骑鸾鹤，踏碎天都峰上云。欲起轩辕问九鼎，道衣重侍玉虚君’”。^⑤据《歙县志》记载，清乾隆二年夏黄山突降暴雨，大雨三天三夜，引起山洪，祥符寺被冲毁，成为废墟；慈光寺在朱砂峰下，旧名朱砂庵。明嘉靖间玄阳道人始建，匾额“步云亭”。万历三十四年，僧普门入山后，玄阳之徒福阳将亭转给普门，改名法海禅院。万历三十八年，普门进京，万历帝、李太后及郑贵妃，先后赐予佛牙、金佛、七层万佛像以及建寺帑银，李太后赐名、万历帝赐额“护国慈光寺”。康熙五年二月，歙人黄俱等捐建大殿，并修藏经阁一百余间，四年建成，共费银四万余两。康熙四十年，中洲禅师又募银二百两，维修寺宇。康熙帝御书“黄海仙都”四字，悬于大殿。一时香火鼎盛，为当时徽州、宁国二府梵宇之冠。至咸丰间，万佛像毁于兵火，僧人流散，寺宇颓废，景象萧条。僧人素月、性海、明心等留守，多次修补。民国初，住持僧雪岭添造功德堂，重修门楼，塑罗汉等佛像80余尊，悬“敕赐护国慈光寺”匾于山门；掷钵禅院在钵孟峰下山坞中，此山坞俗称丞相源，原为歙岩镇汪图南书院。明万历三十七年，寓安禅师到此，“乞地于汪，不数月，遂成梵刹”。^⑥歙人潘之恒为之题曰“一钵”，太史汤宾尹题为“掷钵”。崇祯间，歙县县令傅严题书“云谷”二字后，遂改名为云谷寺，同里聂炜曾撰文记其事。清道光间曾设坛授戒。宣统三年，一场火灾使寺宇化为灰烬。

上述“四大丛林”是明清时期黄山最为著名也是影响最大的四所寺院，其发展鼎盛期基本在明代中晚期及清代前期，可谓明清黄山佛教的四个主要中心。围绕上述四个中心，结合明清时期黄山山路的开发，其又分别形成了以东、南、西、北四条山路为轴线的寺院分布格局。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结合相关史料，对明清之际黄山佛教寺院的具体位置进行了统计，列表如下：

① “区域宗教系统”学说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吴疆教授首先提出（见欧阳楠《“大中华地区区域宗教系统”会议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3期），由这一学术引申，实际上按照不同宗教划分，历史时期中国亦应存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不同宗教的区域系统，这是当前中国宗教史研究较为新颖的视角。当然，就其基本学术理路来说，其大致沿袭了以空间视角来观察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现象这一学术路径，在理论和方法上亦有所创新。就宗教史研究而言，相较于以往宗教史研究来说，这一学说则无疑有助于厘清不同时空视角下宗教的差异化发展面貌，理应引起重视。

②③④⑥（清）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卷二“建置”。

⑤ 《黄山志》编纂委员会《黄山志》，第218页。

表3 明清之际黄山时存寺院统计表

建立时期	名称	地理位置
唐	翠微寺	翠微峰麓
唐	祥符寺	紫石峰下
唐	广福寺	太平西乡
宋	松古庵	叠嶂峰下
宋	普佑院	曹溪
宋	重兴寺	太平乡
宋	新兴寺	太平
宋	乡林寺	太平西乡
宋	兰若寺	太平东乡
元	大悲庵	芙蓉峰下
元	巢翠庵	叠嶂峰下
元	吕公庵	叠嶂峰下
明	慈光寺	朱砂峰下
明	颖林庵	石筍缸
明	兜率庵	合掌峰下
明	文殊院	天都莲花两峰间
明	大悲院	光明顶
明	宝珠庵	香炉峰下
明	石鼓庵	石鼓峰右
明	海潮庵	海子
明	引鍼庵	引针峰下
明	九峰庵	紫石峰左
明	黄谷庵	丞相源东
明	掷钵禅院	钵孟峰下
明	桃源庵	桃花源
明	御泉庵	双嶺
明	水晶庵	庵居嶺上，去甜珠嶺三里许
明	香山庵	珠湖山
明	大觉禅寺	太平三折嶺
明	不立名字庵	莲花峰麓
明	青莲宇	莲花庵右
明	净林居	莲花庵左
明	莲顶庵	莲花峰月池下
明	翠云庵	翠微峰西
明	水月庵	不详
明	西明庵	狮子峰旁
明	莲花庵	桃花涧上
明	双举庵	曹溪
明	平天院	平天缸
明	镜台庵	曹溪
明	墨浪庵	白龙潭上
明	海潮庵	海子

续表

建立时期	名称	地理位置
明	龙蟠坡庵	青鸾峰下
明	云涛庵	云门峰藏南壑
明	散花庵	散花坞
明	定空室	始信峰绝顶
不详	大慈庵	白沙岭
不详	横坑庵	云门峰下
不详	钓桥庵	汤岭北
不详	药师庵	海门
不详	白沙庵	白沙缸
不详	都赛庵	下丞相源十里许
不详	中源庵	丞相源中源
不详	继竺庵	钵盂峰下
不详	芙蓉庵	距松谷三里
不详	老庵	石筍峰下
不详	松谷脚庵	松谷别筑
不详	净土庵	浮溪巡司前
不详	挹翠庵	黄山云门峰,近江村
不详	梅檀林,原名海胜庵	海子
不详	骊珠室	丞相源
不详	庆明庵	上汤
不详	念庵	梅村
不详	不染庵	甜株岭
不详	钟灵院	蒋村
不详	山口岭茶庵	不详
不详	玉壶庵	开黄里
不详	石门庵	虎村
不详	问奇庵	异松嶺
不详	胜莲庵	曹溪
不详	龙吟寺	近石门
不详	斌里庵	焦村
不详	三官堂	焦村
不详	佛岭庵	潜川
不详	萝青庵	曹溪

资料来源:(明)彭泽修,汪舜民纂《徽州府志》,明弘治十五年刻本;(明)何东序修,汪尚宁等纂《徽州府志》,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清)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民国二十四年安徽丛书编印本。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明清之际黄山尚存 75 所寺院,其中有明确年代可考的有 46 所,修建于唐代的有 3 所、宋代的有 6 所、元代的有 3 所、明代的有 34 所、年代不可考的有 29 所。明朝是黄山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新建大量寺院,明朝新建的寺院占据明清之际黄山寺院现存的主体。唐宋元时期兴建的寺院,在明朝也得到修缮,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黄山中心为海子,即光明顶。普门开山后,初步形成了四条登山路,这四条山路也是进登海子的要道。释性航曾较为详细的记载了登海子的四条道路,“东由苦竹溪、十三湾、九龙潭至丞

相源；西由汤岭至白云庵出炼丹峰；又北历翠微寺、松谷庵、五龙渊，遂登石笋缸。然石缸路稍坦夷，但经秋雨，路断不可以揭；丞相源登天海，路多沙溜，亦难步履；唯从汤池上数里为慈光寺，又上为莲花洞，为文殊院，为炼丹台，为光明顶，即天海也，是为黄山南路，蹬道可攀，倦亦可止”。^①按照四条山路的地理位置可以把黄山寺院分为东、南、西、北四路，在明清之际现存的75所寺院中，除去2所寺院位置不可考，其余73所寺院，位于南路的有30所，北路有26所，东路有13所，西路有3所，大悲院位于光明顶。寺院集中分布于黄山南路与北路，显然这与黄山的地理环境与山路开发密切相关。

表4 明清之际黄山时存寺院分布表

路线	寺院
南路	祥符寺、慈光寺、文殊院、引鍼庵、九峯庵、掷钵禅院、桃源庵、御泉庵、水晶庵、香山庵、不立名字庵、青莲宇、净林居、莲顶庵、莲花庵、平天院、墨浪庵、龙蟠坡庵、云涛庵、大慈庵、横坑庵、白沙庵、继竺庵、念庵、不染庵、钟灵院、玉壶庵、问奇庵、龙吟寺、佛岭庵
北路	翠微寺、广福寺、松谷庵、重兴寺、新兴寺、乡林寺、兰若寺、大悲庵、巢翠庵、吕公庵、兜率庵、石鼓庵、海潮庵、大觉禅寺、翠云庵、西明庵、海潮庵、散花庵、药师庵、芙蓉庵、松谷脚庵、梅檀林、庆明庵、石门庵、斌里庵、三官堂、
东路	普佑院、颖林寺、宝珠庵、黄谷庵、双举庵、镜台庵、定空室、都赛庵、中源庵、老庵、骊珠室、勝莲庵、萝青庵
西路	钓桥庵、净土庵、挹翠庵
光明顶	大悲院

“天下名山僧占多”，僧人所占据的皆是山中地理位置优越、风景优美、道路便利的地方。黄山南路与北路也是开发较早的山路，黄山南路有桃花源、天都峰、莲峰、狮子峰等，北路则有翠微峰、紫云峰、叠嶂峰等。黄山东、西路，“东路一，由压相源，路多沙溜。西路二，一由汤岭上白云庵，路径陡峭，狭窄的山路隐现于沙石之间，推挽进步，乃可至一由翠微吊桥，盖因途中所历名胜少，行者亦少”^②，故东、西二路环境相对较差。黄山“四大丛林”中翠微寺位于黄山北路，祥符寺、慈光寺、掷钵禅院位于黄山南路。这些名寺不但规模较大，而且高僧众多，周围自然聚集了大量寺院。

至清末，黄山尚存寺院21所，其中位于南路的有7所，北路有8所，西路有1所，东路有4所，大悲院则位于光明顶。此时黄山寺院大幅减少，仍主要位于南路与北路，东路次之，西路最少。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明清之际和清末黄山所存寺院数量差异较大，但是在空间分布上都集中于黄山的南路与北路，并且分布在“四大丛林”周围。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分布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黄山南路与北路开发时间较长。黄山南路靠近歙县，北路则与太平接壤，唐宋时期，黄山南北两路已有近10座寺院，道路相对完善。其二，黄山南路与北路自然风景秀丽，地形相对较好，适宜建立寺院；西路道路艰险，名胜风景较少，游人较少，所以寺庵也较少。黄山寺院多数由黄山名僧和周边士绅修建。修建寺院时自然优先考虑清静优美之处，桃花源、翠微峰、天都峰等大多位于黄山南、北路，自然寺院数量较多。其三，“四大丛林”的影响。黄山“四大丛林”有3所寺院位于黄山南路，1所寺院位于黄山北路。“四大丛林”不仅名气大，而且寺院规模也较大，寺院驻锡僧人也较多。为了便于佛法交流，大多数寺

①（清）释弘眉撰《黄山志》卷六“游记”，清康熙六年刻本，慈光寺藏版。

②李卓珈《明代黄山旅游研究》，安徽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院都建在“四大丛林”周边，自然使得南、北路聚集效应明显，成为黄山寺院的主要聚集之地。

总体而言，明清黄山佛教寺院在空间结构上大体形成了以“四大丛林”为中心、以四条山路为轴线的空间分布格局，且长期较为稳定。就道场建设而言，这使得黄山作为佛教名山的区域系统大致得以形成，而这显然与黄山的地理环境及周边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三、四众共筑与明清黄山佛教的发展

徽州自古偏安江南一隅，黄山更是隐于山林之中，水陆交通都极为不便，长期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自然交通条件的限制，明代以前很少有人至黄山，“吾州黄山，号称江东巨镇，峰峦岩洞，仙踪异迹尤多，而卒不获于通典，与诸洞天福地并，何耶？以其僻界徽池宣三州之间，舟车不通，人迹罕至隐而弗彰也”，^①再者黄山山多土少，交通不便，时有黄山“已如天上，惶及游事”的说法，^②加之其山势高耸、道路狭窄，无法大规模向山上运送建材，这对于寺院的修建是极为不利的。那么，其何以在明清可以形成一个建寺、修寺的高潮并成为江南较为著名的佛教名山，显然这是与多方努力的营造分不开的，而这其中又以政、学、商、教四种力量最为重要。

国家的支持显然是明清黄山佛教得以迎来发展高峰的关键。在中国传统社会，帝王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其往往因表率作用而带来一种示范效应。明初黄山寺院新建数量虽极为有限，后由于限佛政策的实行，大多寺院或撤或并，但新建寺院御泉庵却因相传明太祖朱元璋驻兵于此，口渴得清泉而建寺，并因此得以保留。明代皇家褒奖之作用于黄山佛教者莫过于慈光寺。自万历三十四年普门和尚主持慈光寺后，其虽有变化，但终拙于经费等原因，名声有限。而万历皇帝崇信佛教，万历之母慈圣皇太后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万历尊封她为“九莲菩萨”，“太后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③万历皇帝为尽孝道，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敕建各大寺院，为众多寺院敕额，全国因此佛教兴盛。万历时期，“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④全国佛教得以复兴发展。万历二十七年，为了“庶表朕敬天法祖之意，弘仁普济之诚，使海宇共享无为之福”，^⑤万历皇帝向命所司印造金藏六百七十八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其中就包括慈光寺。万历三十七年，普门和尚为扩建禅寺进京，获得了万历皇帝的支持，敕封慈光寺为“护国慈光寺”。神宗皇帝、李太后等都给予了奖赏，黄山佛教显赫一时，“峰峦环秀，甲於江南”。^⑥

明神宗皇帝，为保国佑民，自批册施银三百两，东宫出银五十两，铸造七层四面毘卢大佛，其余皆王娘娘顺上意出银造完。蔡公奏开黄山因缘，遂允赐黄山，并颁赐藏经一部，经首序文乃帝自制。

慈宁李太后辛亥年三月十六日赐寺名护国慈光寺，復赐银三百两为开山兴工费用之资，壬子年二月初六赐银二百两并紫衣佛冠布帛等物，至三月二十四赐渗佛金叶子五十一两，并造大悲佛及钵盂锡杖，工价银三十两。

中宫圣后王娘娘壬子年六月初六日赐银五十两，近侍刘公辦齐观音寺四面大佛前，并赐普门和尚鞋帽布帛等物，三月二十四日赐造佛银五百两，五月初五日，内侍陈恩送佛赐路费银五百两兼至山安佛道场齐银三百两。^⑦

①②⑤⑥ (清) 闵麟嗣《黄山志定本》卷三“艺文”。

③ (清)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一十四《列传》第二“孝定李太后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④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79页。

⑦ (清) 释弘眉撰《黄山志》卷三“御制”，清康熙六年刻本，慈光寺藏版。

崇祯时期黄山佛教的发展还受到荆州惠王的支持，十四年冬，一斋大师与徒弟奉惠王之令来黄山驻锡，主持掷钵禅院，“启建千佛道场，延请高僧四十八人，又请昆尼大和尚登坛度众，受戒者千人，当时盛况空前，呼佛声震动山谷。”^①辛巳年，惠王入掷钵禅院，赐掷钵大宝法王额。第二年，新安檀越请一斋大师踞慈光寺方丈，惠王赐金书华严经、七佛衣贮在慈光寺。^②一斋主持期间，云谷一带得到了一定的开发。明朝后期，在当时整体崇佛的背景下，黄山迎来了建寺修庙的高峰时期。清初康熙时期，奉行顺治时的佛教政策，篆刻佛教经典，兴修大量佛寺，据统计：康熙六年，“通计直省敕建大寺院共六千七十有三，小寺院共六千四百有九；私建大寺院共八千四百五十有八，小寺院共五万八千六百八十有二……共计寺院走万九千六百二十有二”。^③康熙帝平时也好为古刹书额题匾，并称“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书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④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三月回銮，驻蹕江宁，时安徽巡抚刘光美随侍行在，慈光寺主持呈《黄山图经》，蒙御书“黄海仙都”四大字，以赐钩摹制额悬于慈光寺佛殿。慈光寺此时有僧众100余人，为黄山首刹，徽、宁两府梵林之冠。康熙时期，黄山新建寺院包括甘露庵、白龙庵、竹林庵、集庆庵等，修葺寺院包括玉壶庵、墨浪庵、慈光寺、大慈庵、狮子林、钓桥庵等，其中慈光寺在康熙五年和四十年进行了两次扩建修缮。

徽商的财力支持是明清黄山佛教得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僧人不事生产，寺院之修建多依世俗力量，而黄山由于地形险峻，可以说山上寺院修建较之他地更耗财力、物力。明清正是徽商鼎盛时期，依托徽商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徽州之宗族势力较之一般地区也要雄厚的多，可以说若无徽商及徽州地方宗族支持，明清时期黄山佛教之发展则无从谈起。事实上，也正是在徽商及地方宗族力量的支持下，明清时期黄山佛教发展才较为顺利。翻检史籍我们不难发现明清时期徽商及地方宗族支持黄山佛教发展之事例比比皆是。宣德年间，馆田李氏李德庄重建松谷草堂，改为寺庙，名松谷庵。宁国府知府书额，又题“东土云山”四字，堂后“褫黄”二字，出自汤宾尹手笔；岩镇潘之恒在普门开山时，给予大量资助。明万历丙午正月，普门在潘之恒的陪同下，进山遴选庙址，并如愿以偿地得到福阳道人转让的朱砂庵。之后普门进京请封，潘之恒又为他提供了财力资助；崇祯九年，鲍应鳌重修御泉庵；康熙五年，为了迎接七层万佛像，歙人黄僕等捐建慈光寺大殿，并修藏经阁一百余间，四年建成，共费银四万余两。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嘉靖四年邑人吴传芳重修普佑院的事例，婺源汪鋐有记：

重修大圣山普佑院碑记^⑤

旧有普佑院，岁久浸敝，元至正中僧募里人谢彌高等尝修葺之。更歷於今近二百余年，院日就圯，而住持者贫亦特甚，岁不能存。僧名普智者，用乃大懼募於众卒，无以应闻。溪南吴传芳字以述者，尝不惜大费鑿石斲路。自曹柘嶺直抵汤口，由汤嶺以达於汤池。近又鑿石结亭覆於上，蓋千古一见……又捨土田二十亩，俾为长住之资，由是行者发偉观於苍山古沐之间，居者获美荫於良畴嘉畛之上，兹山得吴君而一旦焕然有加於旧矣。普智感吴君之德谋於其众，立一堂为吴君生祠，世奉香火用报厥德，亦以劝夫世之好义者也，乃请予纪之。从这则碑记可以看出普佑院的发展历程及修葺始末。唐宋时期建立的寺院，至明朝时期已经倾颓，而寺僧贫困，无法承担修缮所需的资金材料，求助于山下士绅，依靠士绅的资助寺院修葺才得以完成，这也是明清黄山大部分寺院的情况。

①（清）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卷二“人物”。

②（清）释弘眉撰《黄山志》卷二“律宗”。

③《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九十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85页。

④《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9-80页。

⑤（清）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卷三“艺文”。

文人雅士的弘扬是明清黄山佛教得以发展的舆论先导。自宋代以后,由于三教合流,儒、释、道互为酬唱、交相呼应便屡见不鲜。明清时期江南为全国财富之地、人才渊薮,文人雅士与高僧大德时有互动、并行不悖。特别是自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心学”影响力在江南地区的不断扩散,加之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文人雅士寄情山水日益增多,游历之风盛行于社会。而徽州作为广义“江南”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水人文俱佳,特别是随着黄山不断为世人熟知,更成为文人雅士寄情山水的好去处,这其中便不乏与黄山佛教发展相关的事例,特别是随着普门开山,黄山佛教日益兴盛,文人墨客来黄山不再是单纯欣赏美景,更多的是来探寻佛寺古刹,并留下大量诗作。明代陈宣登翠微寺作诗“翠微古寺枕黄山,院宇萧萧水竹间。锡影已虚迷法界,梵音尤是到禅关”^①;程珊雪后游祥符寺作诗“四顾漫漫雪满山,披裘策杖出禅关。云深时见人踪绝,林暝唯从鹤径还。万树光连峰尽白,六华飞点鬓先斑。眼空银海三千界,怅望仙居不可攀”,^②感慨寺院美景、佛寺繁盛;朱鹭曾评价黄山和华山的特色“太华,三代以前之镇岳,尊天祀神,不供养佛。黄山近辟灵区,名动三宫,辙获迎毗卢如来,及十二愿佛,大悲、文殊、普贤诸大菩萨……黄金宝相,得未曾有。太华羽流,仙火高者为全真,黄山皆比丘焚诵,次亦优婆塞,行师普门,超然法器,堪与微语,商向上事”。^③具体说明清文人来黄山进行的佛事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游览佛寺。朱苞在游览慈光寺时就盛赞“金像巍焕,颁自中宫,禅宇行律,亦颇精严川”^④。其二,倡立佛寺。余书升就在黄山新建了桃源庵、颖林庵、青莲宇,黄汝亨倡立净林居,汤宾尹“倡募诸檀,非为僧谋,盖为士之偕游偕隐者”^⑤。其三,拜谒僧人。夏凌云就曾作《寄怀雨和尚》赞颂雨峰和尚的功绩。上述文人墨客的咏佛诗赋,对黄山佛寺的肯定和赞扬,无疑推动了黄山佛教的传播发展。当然,由于明清时期黄山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也因此使得文人雅士与黄山的佛教联系“江南性”特质较为明显,^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佛教“中国化”、佛教名山影响力不同空间层级的具体化差异。

高僧大德的践行是明清黄山佛教得以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就佛教而言,历代高僧大德不但是佛教的信仰者、践行者、传播者,也是其发展的重要推动者。黄山佛教筚路蓝缕,虽发轫较早,但明中期以前一直名不见经传。直至明中期以后,随着大批高僧大德的到来,致力于山路开拓、道场修建,才使得黄山佛教一跃而成为江南的佛教名山。譬如万历三十四年,普门和尚感梦入黄山,在潘之恒、汪元功等徽州士绅和僧心月、阔庵、金峰的帮助下开凿山路。歙县士绅汪元功所修之路,“自黄土岭,傍天都右腋文殊院南麓二观,登天梯,及涉莲花峰中路径,输资辟治十余里”。^⑦之后在众人的努力之下,“初步开通四条山路:南路温泉至北海,北路松谷庵至天海,东路苦竹溪至北海,西路钓桥庵至温泉”,^⑧山路的修建,无疑加快了黄山的开发。钱谦益曾作诗赞扬普门,肯定普门对黄山佛教发展及其开发做出的重要贡献:

慈光寺^⑨

普门头陀行,光明动帝后。两宫赐剃染,少府给组绶。
脱却金纹衣,麻鞋露两肘。毗卢金像设,梵筴琅函剖。
煌煌慈光额,天子维献寿。金貂驰北影,银榜贲南斗。
寺踞天都陇,面势抗龙首。朱砂拱其左,叠嶂掖而右。

①② (清) 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卷六“赋诗”。

③④⑤ (清) 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卷五“艺文”。

⑥ 王开队、柳雪《明清黄山文化影响力的时空阐释:以〈黄山志定本〉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⑦ (清) 闵麟嗣撰《黄山志定本》卷二“人物”。

⑧ 《黄山志》编纂委员会《黄山志》,第8页。

⑨ (明)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之“慈光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

我来礼慈光，俯仰思文母。僧徒日鱼雅，禅诵午晬扣。

空山犹升平，慈恩正摄受。泉流石塔下，桃红碧溪口。

客拜漉水囊，僧持扫花帚。尚祈白毫力，庶复金轮旧。

普门开山后，四方高僧纷至沓来，云集黄山，譬如五台山高僧一乘来此结茅，驻锡狮子林；一心和尚同徒雪奇创建引鍼庵；万历三十八年，寓安禅师募建掷钵禅院，任主持。上述高僧大德的到来无疑使得明清黄山佛教具备了坚实的推动力量。

当然，除上述四种力量外，明清徽州及其周边普通民众亦是黄山佛教得以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不过，考虑到黄山特殊地理环境，普通民众难以负担寺庙建设所需财力，加之明清徽州普通民众中“华云进香”的盛行，^①往黄山进香不甚便利，可能其在明清黄山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较之上述四种要相对弱一些。

四、余论

名山信仰不仅是中国佛教克服“边地情结”的努力，更符合中国文化优越感的“中心梦”。^②而由于中国地域的广大，特别是唐宋以后传统中国各区域化进程的加强，至明清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化认同及区域情结日渐形成，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适应并配合不同区域的文化认同及其区域情结便成为其生存的必然选择。于此，便不难理解，尽管明清时期理学始终居于徽州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但是民众依然需要“华云进香”这样的形式来满足其内心的精神需要。不仅如此，尽管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九华山距徽州咫尺之隔，但是徽州依然需要营造本区域的佛教名山，在此背景下，经过政、商、学、教四众的努力，黄山佛教的兴起便应运而生并因此构建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区域佛教系统。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事例在明清中国可能并非孤例，甚至在不少区域都有上演，考察明清不同区域佛教名山的形成过程并比较其差异，显然是考察佛教中国化、区域化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也是考察传统中国区域化历史进程的重要手段，其学术意义无疑十分重大。

(责任编辑：李建欣)

^① 王振忠 《华云进香：民间信仰、朝山习俗与明清以来徽州的日常生活》，《地方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② 圣凯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信仰内涵》，参见陈金华、孙英刚主编《神圣空间：中古佛教的空间因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